

刘宇红 著

隐喻的多视角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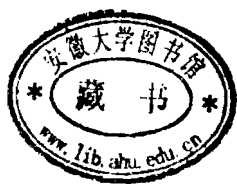
语言新专题研究系列

倪传斌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隐喻的多视角研究

刘宇红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喻的多视角研究/刘宇红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1.12

ISBN 978-7-5100-4147-1

I. ①隐… II. ①刘… III. ①隐喻—研究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5332 号

隐喻的多视角研究

著 者: 刘宇红

责任编辑: 丁 冬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mm × 1245mm 1/24

印 张: 8.2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4147-1/H · 1269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语言科技文库》总序

李葆嘉

当代语言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学与技术的互补时代，信息处理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知识世界的载体是语符系统，信息处理的根本对象是语言信息处理。与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语言符号有可能成为数据处理对象相似，神经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的应用，使得在大脑神经层面探讨语言机制成为可能。这些无疑都引导语言研究走向科技化，“语言科技新思维”（李葆嘉 2001）应运而生。所谓“语言科学”包括理论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分支学科，所谓“语言技术”指语言研究的现代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音实验分析，以及语言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实验分析的技术手段等。就语言信息处理而言，又可以分为语料库研制技术、知识库研制技术、知识挖掘和抽取技术、句法信息处理技术、词汇信息处理技术、语音信息处理技术、语义信息处理技术、语用信息处理技术等。

2001 年 5 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创办了史无前例的“语言科学及技术系”，率先迈出了从传统文科教育范型向现代科技教育范型转变的步伐。“十五”期间，南京师大“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语言信息处理与分领域语言研究的现代化”（陈小荷教授主持），以基础平台建设、资源建设和理论探索等为主，迈出了语言科技研究的一大步。

“十一五”期间，南京师大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联袂申报“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该项目以“语言科技”为引导，以“多学科交叉、跨院系整合、开放型营运”为理念，建设具有前瞻性、原创性、成长性的语言科技高级工作平台。以典型课题的工作原理为核心，进行资源开发和系统研制，拓展语

音科技、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言语能力受损儿童的语言能力研究等新方向。同时造就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以期形成一支高水平的交叉学科团队。该项目设计，体现了工作平台建设、理论创新、应用研究、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的学科发展一体化思路。其旨趣在于，加速语言研究从传统文科范型向现代科技范型的转变，以引领 21 世纪语言科技的新潮流。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项目，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匿名评审，“语言科技创新及工作平台建设”（2008~2011）获批，总投入 1000 万元。总体而言，这一“语言科技创新”团队，分支学科齐全，专业知识互补。涵盖了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义科技、语音科技、实验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二语习得研究、话语行为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期间，项目组成员获批的国家级基金项目达 20 多项。该项目理念之前瞻、实力之雄厚、工程之浩大、经费之保障，为学界瞩目。

2008 年秋，本项目以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为实施单位正式启动。主要有三大任务：建设一个领先性的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立一个独创性的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撰著一套有特色的语言科技文库。

从实验室方案设计到设备招标采购，再到实验室用房改造，经过 8 个月的努力，2009 年 12 月，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成，为语言研究从传统范型向科技范型的转变提供了基本保障。该实验室划分为实验工作区、科研工作区和管理服务区。实验工作区建有语音实验与计算室、神经认知实验与计算室、课堂话语实录室三个专门实验室。科研工作区建有语义科技工作室、语音科技工作室、方言实验工作室、知识工程工作室 I（先秦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 II（中古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 III（敦煌俗语言文字）、语言习得神经机制工作室、语言习得中介机制工作室，以及参研工作室。管理区服务包括办公室、管理室、编辑室和交流室。出席“语言科技高层论坛暨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落成仪式”（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专家认为，该实验室体现了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当代性和先进性，具有整体性、科技型、开放型三个特点，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语言科技新思维”的又一体现。同时认为，该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涵

盖了四个二级学科、四个博士学位点，有稳定明确的研究方向，有合理的设计规划和很好的科研基础；整体设计合理，功能齐备。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标准衡量，很多方面超过了指标。

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是基于工作原理（课题定位—理论方法—技术路线—关键技术—评估方式）而建设的高级平台。一方面，从语言信息、语言知识和语言机制三个层面，围绕典型课题进行设备配置、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一方面，将典型课题研究与工作平台建设融为一体，依据典型课题建设的子平台应具有解决同类课题的功能。

建设语言科技工作平台的目标是要实现语言研究手段的技术化和模型化，总体设计包括三个二级平台和八个子系统。

一、语言信息工作平台 1. 语义科技工作系统（李葆嘉教授主持）：基于词汇语义—句法语义的一体化研究思路，开发“人—机交互语义标注工具”，研制“深度语义标注信息库”；研制“幼儿（2~6）日常话语跟踪语料库”，完成幼儿语义系统和话语行为分析研究。2. 语音科技工作系统（顾文涛教授主持）：研制“多语言、多语境、多语用的语音语料库”，基于声学信号分析、感知实验和数学建模，完善语音韵律理论与相关技术应用。3. 方言实验工作系统（刘俐李教授主持）：完成“网络版汉语方言有声语料库”，拟定系统的可操作性语音、词汇、语法实验模型和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新兴交叉学科“实验方言学”。

二、语言知识工作平台 1. 先秦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陈小荷教授主持）：研制“先秦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先秦文献自动分词算法、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算法、同指专名检索软件工具等，完成“先秦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2. 中古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董志翘教授主持）：研制“中古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中古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中古文献自动分词和标注工具等，完成“中古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3. 敦煌俗语言文字统计与检索系统（黄征教授主持）：研制“敦煌文献资料库”、“敦煌文献俗语词语档案库”，开发相应工具，完成“敦煌文献资料与知识检索”。

三、语言机制工作平台 1. 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系统（倪

传斌教授主持):研制“英语受蚀词汇库”等,基于行为学、脑成像和脑电三维度模型,进行中国人英语习得与磨蚀的神经机制研究,完成“基于神经机制的英语个性化学习分析系统”。2. 二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系统(肖翼强教授主持):研制“留学生汉语口语中介语语料库”,基于中介语理论、对比分析理论、偏误分析理论以及二语习得影响因素等,完成“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

这一工作平台,既是科技研究平台,也是人才培养平台,即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体系。

作为本项目的文本成果,《语言科技文库》包括计算语言学研究、语义语法学研究、汉语方言学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新专题研究六个系列。其总体特征为:领域的开拓性、理论的原创性、选题的新颖性、方法的交叉性、考据的精审性、成果的应用性。在研究过程中,除了数据采集分析、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材料。陈小荷提出的先秦文献信息处理新方法,从先秦典籍注疏文献中挖掘出用于自动分词和词义消歧的知识,再注入已开发的古汉语分词和词性标注工具中去,所取得的先秦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先秦词汇知识自动挖掘等成果均具开拓性。李葆嘉提出的语义语法学理论和话语行为理论,基于研制专用语料库或语义信息库和技术手段,开拓了语义网络建构、深度语义分析和话语行为研究等新的领域。刘俐李建构的实验方言学理论和方法,为方言学向现代科技方法的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黄征多年来从事敦煌文献及其俗词语文字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系列中的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以及敦煌写本字词考释、以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的敦煌佛典词语和俗字研究、两汉声母系统研究等新见迭出。肖翼强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二语习得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已经产生了影响。钱玉莲的汉语介词与相应英语形式比较研究等专著各有亮色。倪传斌依据语言测试和认知实验等数据,从行为学、生理学和语言学三个层面分析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外语磨蚀的相关因素。刘宇红基于隐喻的理论探讨,对各类隐喻形式的结构、特性和解读规律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入探讨。

《语言科技文库》所收论著,由作者在2008年12月申报选题,

2011 年始逐步完稿。系列主编审读了书稿，主要就其学术价值、章节安排、内容关联、行文表述、图表绘制等方面，提出审阅意见。此后，作者们对书稿又进行了修改和润色。《语言科技文库》的作者，大多数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对于我们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走进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而言，出版论著可能已不足为道。然而，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其论著的出版既是几年来研究的结晶，也是对其继续探索的促进。换言之，“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年轻教师搭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和教学平台。学科带头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携后进。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或学术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探索行为，然而复杂问题的研究，无疑需要群体协作。“学科建设”或团队合作模式，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这种模式涉及总体规划、多方协调，是需要付出精力和心血的。2008 年，通过投票方式推举我担任该项目总负责时，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劳动班委”。2009 年，前往安徽大学拜访黄德宽教授时，曾谈到“学科负责人的任务就是规划设计，争取项目经费和提供科研设备设施”，得到黄教授的赞许。2010 年，申报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评审专家柳士镇教授提问的“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项目，各学科之间的协调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做法”，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后学，深知交叉研究之艰、学科整合之难。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协调需要借助行政机制，但凭借行政方式并非就能完成。当时的回答是，目前做到的是建成了一个可以合作研究的场所，至于学科之间的进一步沟通合作应有较长过程。有一点很明确，只有通过交叉项目，相应学科才能渗透，合作者才能逐步磨合。我们只是在一步步探索。

十一五期间的“211 工程”建设项目即将完成，但是学科建设的任务并没有结束。2010 年，“语言信息科技研究中心”被评审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语言科技”这一交叉领域注入了新的建设活力。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除了“跨院系整合、多学科交叉、开放型运行”理念，需要凸显“合作性攻关”。围绕交叉性项目，实施计算语言学、语音科技、神经语言学、语义科技等力量的联合攻关计划。只有通过全面开放以及和与国内外同

行的合作交流，才有望建成具有影响的语言科技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基地。

十年前，我（2001）曾写道：“语言科技”的内涵是以理论研究为指导，以描写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枢纽，促使语言研究向计算机应用、认知科学和现代教育技术领域等延伸，沟通文理工相关学科以实现语言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技术化。“语言科技”的外延为语言工程科技、语言教育科技和语言研究科技。其中，“语言研究科技”是将语言研究活动与资源建设、软件开发相结合，其目标是实现语言学自身的科技化。还应包含语言实验、数据处理这些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研究的科技手段。

虽然语言学家不可能也不必都转向语言计算或实验研究，尽管描写、考据和内省始终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具有一定的语言科技意识却非常必要。语言学家只有了解有哪些可供利用的资源、软件或仪器，才能提高其研究深度、精度和效率。语言学家也只有了解到信息处理的语言研究需求，才有可能为之提供可资应用或参考的基础成果。“语言科技”是21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此为出版缘起。是为总序。

2011年8月谨识于南都

束 序

如果说，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国外“隐喻热”的集中表现时期，那么，90 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外语界隐喻研究最“热闹”的阶段。隐喻研究之所以会“热”，一方面是因为隐喻现象本身非常丰富、有趣，二是因为与传统的隐喻研究注重其修辞效果，现代隐喻研究把隐喻看成是一种认知现象，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密切有关。近年来，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试图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隐喻对人类思维和日常行为的重要影响。随着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有关隐喻的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入。

刘宇红教授的新著《隐喻的多视角研究》即将出版，作者邀我作序，原因之一是我“是国内较早关注隐喻的认知研究并出版过相关专著的人”。

翻阅了由十五章组成的书稿，我有以下几点感想，愿与读者分享：第一，这是一本作者长期研究积累的成果，不是临时、仓促之作；书稿涉及的文献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的许多相关学科，说明作者涉猎的隐喻研究领域较广，视野较宽。第二，书稿分为理论篇和应用篇，说明作者既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又关注研究的实际应用。作者在理论综述和分析框架构建的同时，致力于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第三，“应用篇”中收集和分析的语料既涉及军事、计算机，又涉及诗歌、网络用语等，说明作者平时阅读范围十分广泛，对相关语言现象也比较敏感，这两者对语言研究者来说都十分重要。

在此，祝贺作者的新著出版，也期待在现有隐喻研究的基础上，有更多、更深入、更有说服力的隐喻研究成果涌现。

是为序。

束定芳

2011 年 4 月 16 日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前 言

语言包括隐喻和非隐喻，比如把外科大夫称作“屠夫”是隐喻的说法，称作“医生”是非隐喻的说法。隐喻和非隐喻的区别在于，一般来说非隐喻是一种更自然、更容易被理解的说法，相反，隐喻是“换言之”的说法，在思维上拐了一个弯，所以较不自然。当然，我们不排除某些隐喻，比如电脑桌面、文件夹、回收站等，在被充分认可之后，可能比非隐喻具有更高的可接受程度。

判别隐喻和非隐喻必须有语境作为参照，因为“医生”和“屠夫”都是很自然、也很常用的词汇，只有当外科大夫在语境中并且成为指称或命名对象时，“屠夫”才是隐喻用法。假如，一位教师在批评顽劣的学生时自称为“医生”，那么“医生”也是隐喻用法。所以，词汇隐喻叫做“概念隐喻”，只有当一个概念在特定语境中代替另一个概念行使指称或命名功能时，它才是隐喻。

系统功能语法在谈论意义潜势实现为词汇语法形式时，提出了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概念。客观事态中有实体、有过程、有性状，分别实现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这是非隐喻的形式。如果名词对应过程或性状，即过程或性状被名物化了（nominalized），如 explosion 或 abstractness 等名词形式，则是语法隐喻形式。在句法层面，六种及物性过程分别对应六类人类活动的场景是非隐喻形式，如果交叉对应就是语法隐喻形式，比如，人类的身体运动（如爬山）是物质过程，所以“我们爬到了山顶”是非隐喻的说法，如果换成表示认知活动的心理过程，如“山项目睹了我们的到来”，就是语法隐喻。

判定语法隐喻不必有特定的场景作为语境，因为一个句子，不管其结构有多简单，它本身是对一个场景的描述，所以句子本身对应一个场景，即语境。

一个新问题出现了，是不是在特定的场景中，我们总是能够找

到最适合描述该场景的句型结构？的确如此，至少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Halliday 是这样认为的，他把最适合某场景的句型结构称为一致式（congruent）的表达法，把比较不适合某场景的句型结构称为非一致式（incongruent）的表达法。一致式与非一致式的对立可能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非一致式是不好的，或者说不合适的。为了避免这种误解，Halliday 把非一致式的表达称为“语法隐喻”。

“语法隐喻”本身是一个隐喻，它以概念隐喻为本体，以词汇语法层面的“换言之”为喻体。隐喻基于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概念隐喻和语法隐喻的相似性在于，本体和喻体中总有一个是比较自然的，是参照系，而另一个是比较不自然的，是衍生物。

作为喻体的“语法隐喻”不同于作为本体的“概念隐喻”，如同在特定场景中“医生”不同于与“医生”具有同指功能的“屠夫”。对概念隐喻来说，一种形式对应两种意义，比如“屠夫”的意义之一是“以屠宰牲畜为业的人”，另一种意义可能是“医术拙劣、草菅人命的外科大夫”（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才能被确认）。语言形式是直观可见的、具体的，意义是相对抽象的，如果用上下关系来描述两者的差别（这又是隐喻！），那么概念隐喻是“从上往下”看，即两个概念（或者说两种意义）对应同一种形式。语法隐喻是“从下往上”看，即两种形式对应一个概念体，比如用“我们爬到了山顶”和“山项目睹了我们的到来”这两种形式描述同一个事态。

在对隐喻的定义中，我们使用了“自然”与“非自然”的说法。这是从认知者的角度来判定的结果，即人认为自然或者非自然。既然是人的视角，就必然体现人的习气，所以“自然”源于人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已经习惯了某种语言形式。隐喻的产生是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隐喻的消亡（即非隐喻化）也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因此，我们只能在共时层面来谈论某种语言形式相对于某种意义来说自然或较不自然。

举例来说，“山头”、“山腰”、“山脚”都是隐喻，是把山隐喻成为人的派生隐喻，我们丝毫没有觉得它们不自然；相反，如果不使用这些隐喻，我们无法指称或命名山的不同高度的那一截，即使勉强描述出来，那才叫“不自然”！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第一个把山隐喻成为人的说话者，他所发明的“山顶”、“山腰”、“山

脚”等说法肯定是唐突的、不自然的。所以，对“自然”与否的认定不能离开语言发展的特定阶段，也不能离开特定的语境和言说对象。

说到语言发展的特定阶段，其实从发生学的时间先后并不足以区分“自然”与“非自然”。因为非隐喻不一定是晚于隐喻出现的，比如电脑桌面、文件夹、回收站等隐喻至今还没有非隐喻的对应形式，也许以后也不会有，因为我们很满足于这样的隐喻说法。我们把这样的隐喻称为“构成性隐喻”（constitutive metaphor），即它们构成了我们对某客体所拥有的唯一的称谓，舍此之外没有非隐喻的表述方法。

发生学关注的是某客体（或某观念）是如何发生或产生的。那么，语言是如何产生的？中国先人提出了“取类比象”的观点，通过仰观俯察，终于对生活中关系最密切的一批事物完成了命名的过程。取类比象的过程是隐喻化的过程，一如山头、山腰、山脚等名称的产生，亦如电脑桌面、文件夹、回收站等隐喻的产生。揭示汉字隐喻意象的宝典是《说文解字》，比如日边草木茂盛是“春”的原型意象，在甲骨文中“春”的意象表达为：



在隐喻意象被建立的同时，非隐喻化的进程也已经开始了，比如经过多次变形和语义演化的“春”字，“草木茂盛”之义不一定是目击“春”字时最先被提取的语义内容。同样，山头、山腰、山脚等说法也不一定立即让人产生直立的人的意象，更不用说“在校园里”“在房间里”这样的隐喻能立即让人把校园和房间理解成为某种容器。这种较难让人唤起它的隐喻渊源的名称，被称为“亡隐喻”（dead metaphor）。亡隐喻是非隐喻化的终极状态，是一种结果。当然，我们不排除在特定语境中亡隐喻的语义源头可能被重新激活，甚至产生新的隐喻义。但不管怎样，隐喻化与非隐喻化是两种平行的力量，伴随着语言产生与进化的全过程。

隐喻研究离不开语言类型学和文化传统的差别。上文说到，汉

字是取类比象的产物，不仅如此，许多词汇基于不同意象的组合，句法结构又具有相对于客观事态的语义象似性（iconicity），在篇章层面，汉语的使用者喜欢以讲故事的形式来说明抽象的道理，每一个故事就是一个隐喻意象。和汉语不同，英语是一种更具有逻辑特质的语言：拉丁字母虽然与汉字同源，即同为象形符号，但是拉丁文字的发展轨迹偏离了象形的发展路径，走上了表音的道路，词汇的衍生（如派生词）主要依靠抽象的词缀，句法结构和客观事态的语义象似性也较弱，篇章结构主要以线性方式推进，以逻辑联系作为主要的连结纽带。

所以，汉语被认为是诗性语言，诗性语言培育了以周易为代表的整体性思维，或者说隐喻思维；英语是逻辑上更严谨的语言，逻辑上的严谨性和语言文字的抽象性造就了一种更适合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习惯和思维范式。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化和语用上的这种差别。“他的脸是大苹果”是概念隐喻，苹果意象的使用使得对“脸”的描述更加生动，但是在英语中 *Her face is big and round and pink* 可能比 *Her face is an apple* 表达更精确、更直接。又大又圆又红等概念特征包含在“大苹果”这一隐喻意象中，但“大苹果”除了表达“又大又圆又红”这些特征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在当前语境中可能误导听话人的语义特征。

偏好隐喻意象和偏好概念特征的这种差别不是孤立的，在文化层面，这种对比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可以拿中医和西医来做一个对比。对中医来说，许多植物的根、茎、叶、花、果，许多动物的皮、毛、骨、肉甚至排泄物都可以入药。中国人相信中医药的疗效，也推崇各种养生食品，认为“药补不如食补”，这与中国人的隐喻情结是相同的。用隐喻意象“大苹果”来描写一张脸的效果，就如同吃大苹果能够“生津止渴、润肺悦心、生津开胃”的效果，这是食补收到的效果。说英语的人当然也吃大苹果，但是说英语的人贵在发现了大苹果为什么有上述功效，即贵在发现了苹果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多酚及黄酮类”等营养物质，这些成分可以从苹果等食物中提取出来，做成高纯度的可以量化服用的片剂、针剂，在患者出现特定症状时按剂量服用，这样的

有效成分相当于从“大苹果”这一意象中提取的语义特征“又大又圆又红”。“又大又圆又红”的描写是抽象的，而且是可操作的，即可以对这些特征进行取舍、修饰，比如“比较大、比较圆但是不太红”，这样的操作就像对片剂或粉剂的剂量进行调配和组合使用。

对隐喻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两种文化的发展方向。将语义特征提取之后，可以用于严谨的理论思辨，发展出逻辑学和各门自然科学；对具体的隐喻意象的使用，可以创作诗歌、艺术，伦理学和美学得到长足发展。

东西方对隐喻的不同态度是不庸讳言的，但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并不妨碍隐喻在各自语言中的大量存在。在英语国家，对隐喻的研究始自古希腊，自古就分成赞美派和贬斥派，在对隐喻的赞美和贬斥中，隐喻理论也不断地推陈出新。Lakoff & Johnson (1980) 是现代隐喻研究的肇始，自此隐喻研究不断升温。在国内，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隐喻也一直是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的热点。

从 2000 年以后，隐喻研究一直是笔者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10 年来先后有十余篇研究隐喻的论文发表，这些文章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笔者指导的多名研究生也对隐喻研究有浓厚兴趣，余晓梅、伍敬芳、黄元龙、吴倩、朱守信等同学在笔者的指导和合作下撰写并发表了多篇隐喻研究的论文，他们的部分观点和学术主张也被收入本书的内容。

本书包括 15 章，前 7 章构成理论篇，后 8 章是隐喻理论的应用：

第一章 隐喻的哲学史观

本章对始自古希腊的各种哲学传统的隐喻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所涉及的哲学家包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西塞罗、昆体良、毕德、阿尔伯利克、阿圭那、霍布斯、洛克、柏克莱、黑格尔、密尔、卢梭、康德、尼采、理查兹、布莱克、雷科夫与约翰逊。我们认为，哲学家的隐喻观和隐喻研究方法体现了每一特定时期哲学家对世界统一性和规律性的根本看法以及与此相应的认识论传统。

第二章 隐喻本质的心理现实性：实证研究的方法

为了验证隐喻的心理现实性，本章以“重要性是重量”为例，设计了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是，在设定四本书的重要性呈梯级变

化的前提下，不呈现实物和参照物，被试对书的重量估计反映了四本书的重要性等级。第二个实验对同一被试群体给予同样的重要性提示，同时还提供四本书的实物和标明重量的参照物，结果，被试估计的重量不体现书的重要性。两个实验共同验证了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即：一、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概念特征映射是隐喻解读的关键；二、概念系统的基石是意象图式；三、隐喻的经验主义特征离不开被默认文化价值观。

第三章 隐喻的三种结构

名词性隐喻依据映射的性质可以分为语义体映射和关系体映射，与之对应的分别为 AB、ABC 和 ABCD 三种结构。关系体隐喻依赖认知域中语义体关系结构的建立，其实质是将一个关系结构投射到另一个关系结构。关系体映射反映的是动词性的概念隐喻过程，关系体背后是一个概念比的认知结构，在认知中起到背景框架的作用，弥补了认知语境的不足。单纯的 AB 结构无法反映隐喻映射的全貌，对隐喻三种不同结构的讨论能够让我们从形式的角度加深对隐喻本质的理解。

第四章 隐喻结构的数学解析

隐喻包括三种结构形式，即二元结构、三元结构和四元结构。四元结构可以有条件地压缩成为三元或二元结构，压缩的条件是语义项之间的蕴含关系。比例式的数学运算能够证明某些四元结构可以压缩成为三元或二元结构，另一些却不能被压缩。三元和二元结构理解的过程也可以通过数学运算得到证明。从比例式的运算规则，还可以解释四元隐喻不同句型结构之间的转换。

第五章 隐喻关系的可逆性研究

不可逆性一直被认为是隐喻的固有属性之一，然而并非所有结构的隐喻类型都遵循这一规则。与传统的 AB 构式隐喻不同，ABC 构式隐喻在句式上颠倒后隐喻意义依然成立且保持不变，表现出其特有的可逆性。这种可逆性来自于 ABC 隐喻语义结构的可识别性以及构式主谓项的逻辑周延性，其句法与认知的异构关系是 ABC 隐喻可逆的根本原因。隐喻可逆性由句法和认知的相对关系所决定，因此它既不同于句法等同性也有别于认知对称性。通过隐喻可逆性的研究可以发现隐喻句法形式对隐喻认知属性的深层影响。

第六章 非言语隐喻研究

在多个家电卖场拍摄的近百张实物图片表明,家用电风扇的速度标示全都采用了一种以上的非言语隐喻表征。隐喻的生成和解读基于人类共同的经验内容,经验内容的连贯性和因果链特征保证了多个隐喻之间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使不同隐喻之间可以互为参照、互相激活,所以速度标示的认读过程非常简便。但是,某些电扇设计和生产厂家顾此失彼,忽略了隐喻的经验基础和隐喻之间的连贯性,使速度标示的认读较为费解。

第七章 隐喻过程中的非对称性研究

隐喻过程是对隐喻生成和隐喻解读的统称。在隐喻过程中,喻体的部分概念特征被析出,并置换本体的部分概念特征。常规的隐喻过程是喻体和本体之间对称的概念特征置换,而非常规的隐喻过程分为两种,即喻体的概念特征要么析出太多,要么析出太少,由此造成概念特征置换的非对称性。概念特征析出与置换的过程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信念强度,一是认知兴趣,两者同时作用于隐喻过程。

第八章 现代汉语中的军事隐喻

现代汉语中的军事隐喻出现频率很高。人们习惯于将紧迫的、对抗性的工作理解成为一次军事行动,并以此为根隐喻生成八类派生隐喻和更多的次级隐喻。现代汉语中军事隐喻的泛滥不仅是一种语用现象,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根源包括三个方面。

第九章 计算机与互联网术语中的隐喻

本章从认知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分析了普遍存在于计算机及互联网术语中的隐喻,并深入分析了各隐喻内部及不同隐喻之间的连贯性。同时还指出,计算机及互联网隐喻的出现有着理论、词汇、交际等方面的原因,并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运用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十章 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母亲隐喻

本章根据现代隐喻理论和批评语言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政治语篇中“以母亲隐喻中共”(即套用母亲框架)这一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我们认为:第一,政治语篇套用母亲框架主要体现个体的人这一概念域向政治实体概念域的投射,并与中国传统母亲概念框架呈